



# 威權人物的評比－ 從《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 說起

自由時報記者  
趙 卿 惠



臺灣現代化的推手：  
蔣經國傳  
陶涵著；林添貴譯  
時報文化 / 8910  
ISBN 9571332372 / 平裝

在臺灣，五月，檯面上政治人物的出書熱，歷史的功過與個人恩怨，一字字地跳躍在版面上。歷史雖是過去，但政治的軌跡總還是深刻在這塊土地。錢穆國學大師說：「對待過去的歷史，總要抱著溫情與敬意」；不過，顯然臺灣許多為人作嫁的媒體作家，總是對立傳者採取「失憶」的認同。

坊間的「總統書」很多，有些是總統自己寫的，有些是採訪記錄，有些是跟總統有來往的人寫下的回憶，總統書的多樣化，是過去威權體制下，鮮少看見的出版榮景，而這些出版的自由更代表，臺灣走出威權的具体意義。提到威權，我們不得不去看看解開臺灣威權最關鍵的領導者 蔣經國。

由時報出版社，委由陶涵（Jay Taylor）執筆所著的臺灣現代化的推手 《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林添貴翻譯，在2000年10月出版。蔣對臺灣立下四個目標，民主化、臺灣化、強化經濟建設、大幅提昇國民所得

和生活水準、與中國發展工作關係等，回顧臺灣在蔣辭世後的十四年來，真的對政治領導者高瞻遠矚的能力，相當佩服。

這本書引用的資料算是最新，評述也兼具公允；其中應提及的是，因寫蔣傳而招致身亡的江南，是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在1997年初版的《蔣經國傳》，作者筆名江南（劉宜良），這件與臺灣特務白色恐怖畫上等號的暗殺事件，在時報出版的蔣傳中也有描述。時報出版的蔣傳，作者陶涵是美國前國務員資深官員，通曉中國語文及事務，1962-1965年曾任臺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析。本書的特色是引用莫斯科及美國國家檔案未公開的資料，如蔣十六歲在莫斯科求學時，已娶馮玉祥之女馮弗能為妻（頁38），這點是國內評蔣氏書或者是論述蔣氏王朝等文章，從未刊露的部份。

在這本書中，對蔣在臺灣執行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成就，並給予公允的評價。蔣藉由臺灣菁英的「吹臺青」風潮，力圖在臺灣執行民主設計時，先遭致外省強硬族群的作梗，如書中描述「外省人似乎比本省人更加不安。1979年，國民黨內分裂的情勢是播遷來臺之後最公開的一段時候。五月底，一群年歲資深的中央民意代表要求終結島內思想污染，警告反對派人士已經給臺灣共產化開門」，之後，王昇等強硬派對中壢事件後，當局者的寬容相當不安，增加黨內強硬派與改



革派的角力。之後發生美麗島事件，蔣決定大規模的鎮壓，取得國民黨內的團結，以免他的改革進程失控（頁 383-389）。作者在評述這事件時，也對照中國鄧小平當時改革所面臨的相同情況。陶氏指出「北京與臺北一樣，一方面希望有更開放的政治制度，一方面也都認定需要維持黨的統治，兩股力量之間的緊張關係主導人領導階層的動態關係」（頁 390）。也讓人感受到一個威權政府開始改革自己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這點也讓臺灣有些人對李登輝做政權和平移轉卻而未能執行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提出的疑問，提供一個可能的答案。這也同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提及，利用國民黨來執行政治改革的過程，是石磨心的痛苦。可以想見一個威權體制的寧靜革命，對身兼黨政二職的領導者來說，是隨時充滿矛盾、對立。

彭明敏在日本作家上 冬子所著－《虎口的總統：李登輝及其妻》中，對一個一黨專權卻要執行民主的領導者，心力交瘁的情況，有相當生動的描述。「李登輝是宿命地不能不成為在政治上雙重人格，他一方面接受臺灣悲劇的命運，但又得背負矛盾而以自己還算能接受的方法來解決，李登輝的體內一定是作為臺灣人的自己與國民黨員的自己經常不斷地互相對峙攻防」。

歷史，總是這麼有趣與巧合，蔣在臺灣執行的民主與臺灣化，交棒給李登輝，兩人相同地在國民黨內過著雙重人格的政治生活。1983年蔣身體愈發不適，而身負托孤重責（當年委由王昇照料與章亞若私生的章孝嚴、章孝慈生活）的王昇已養成習慣，利用劉少康辦公室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下達命令，劉少康辦公室已成「太上內閣」，使得他可具備最強大的權力基礎，在蔣殞天之後接管大權，王昇有心當國王。（頁 414）在王昇接受訪美的邀請之後，蔣召見並告之要調派職務，兩人結束了長達四十五年的友情；而王昇在告別政戰學校時，也說了「殺了一個王昇，沒有用，因為還有好幾個王昇」，更

讓蔣相信自己對王昇的處置沒有錯，最後王昇被派至巴拉圭擔任大使。

李登輝的接班。蔣認為李是技術官僚出身，而且也透著不是有野心抓權的形象，作為政治人物、經理人和領導人的才幹外，李更具備做為總統的外表形貌和內在條件。（頁 421）李獲提名為副總統不久，國安局發現他年輕時曾加入共產黨，蔣得知後聳聳肩「那也沒有辦法」。可是接班的問題並沒有暫歇，強硬派的情治及總政戰部型的人士，蔣家的人也關切黨主席的位置即不歸蔣家，也可交給忠心的外省人；少數的觀察家也看好蔣孝武，因為他姓蔣。不過，蔣經國仍堅定地執行自己的意志，他在 1985 年接受時代週刊專訪時說「從沒有考量過由蔣家成員繼任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講話時也重申「蔣家人既不能，也不會主政」。（頁 445）

蔣的作法，在當時可謂天破驚地，接著1986年 10 月蔣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時宣布，政府準備解嚴。在宣佈解嚴後，時八十五歲宋美齡闊別臺北近十年，首度返臺。臺灣的媒体猜測，保守派份子促宋回國是有意集結力量，促蔣家繼承大統。宋美齡也說「時下有即溶咖啡，或即飲茶，然而只有矇騙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份子想要是從混亂中圖利而不遵循法律與秩序。保守派畏懼改革的心思，躍躍欲現」。（頁 457）

蔣在1988年辭世，李繼任總統，但對國民黨主席代理的人選，宋美齡寫了一封信給俞國華，信中說「最好不要選舉一位代理主席。」蔣家與老臣認定，若讓一位本省人兼具總統與黨主席的職位，形同敲響國民黨喪鐘。（頁 472）最後宋楚瑜在中常會臨門一踢，發力陳選舉代理主席，並退席抗議，李總算在中常會的贊同下，接掌黨主席位置。

蔣經國終結自己家族的統治，取消黨禁、報禁。運用自己的權力，結束自己，甚至家族的獨裁，這是東方政治裡最難做到的境地。



李繼任之後，提出兩國論，微妙地處理外省與本省人的情結，並成功地做到政權和平移轉，作者提出若干觀察者論點認為，李強化在國內的地位，又增加對北京的談判力道，他的目標口頭唱著一個中國，實質上吻合臺灣人的需要，果真如此，蔣經國地下有知，也會贊同。（頁480）

但如同蔣的政治改革，從政權和平移轉，至真正成形的民主式政黨輪替，臺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過去與蔣結盟為改革派的人士，在歷史的轉角，似乎又背道而馳了，主流之爭，讓臺灣在政黨輪替的路上，驚濤駭浪，至今未休。

殷海光先生曾在《自由中國》提及一篇政治神經衰弱症，對於政治人物因為黨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擴散，而使政治人物有一種病態產生－「滿眼都是敵人，事事可慮，內心高度緊張，情緒無法平衡，對人對事都有不健康的判斷，這樣一來，就成了惡性循環，成了一條牢不可破的錢鍊子。」至於江南之死，似乎也與蔣釋出臺灣化的原因，使得統治階層的保守派外省人越來越驚慌，而種下的惡果有關。

蔣在1984年8月提前釋放美麗島事件的四名被告，選擇吸納臺灣人進入體制。同年當時的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交待竹聯幫陳啟禮、董桂森、吳敦在舊金山市郊大理市劉宅，狙殺劉宜良。許多間接證據顯示，當時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若沒有下達命令安排兇殺案，至少也批准執行，十二年後，某位蔣經國多年的親密同志說，汪希苓一定是替某人掩飾，幾位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信，原本點子應該出自蔣孝武；雖然孝武否認傳聞，然而蔣至少已經相信，孝武生活習性不佳，交友不慎，講話不小心，起碼間接導致劉案，作者確信，蔣經國本人並不曉得有殺害劉宜良的計畫。（頁432）不過，作者也認為蔣經國在任時候，都可以明確交待，搞秘密

活動絕對不能從事政治暗殺，可是他沒有做到。

而劉宜良命案，也讓黨內自由派人士抬不起頭。一個黨和政府要靠黑道來威嚇敵人，絕對不是他們當年選擇投效國民黨的初衷，劉案也讓蔣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和國防部特殊情報局合併，並委由一位非情治單位出身的人接掌，更名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僅負責軍事情報的蒐集。（頁435-6）

1996年5月21日，建立在華盛頓的美國殉職新聞從業人員紀念碑由第一夫人希拉蕊揭幕，紀念碑上九百卅四位殉職的新聞從業人員，劉宜良是碑上唯一的華裔人士。希拉蕊在揭幕獻詞時說，「進入戰地的人，只有醫療人員和記者不帶武器。新聞從業人員甘冒生命危險，目的在尋求真相。記者可能敵不過暴徒或子彈，但記者報導的新聞，卻有可能擊退一支大軍，改變許多人的生命，或維護民主。」（《蔣經國傳》，前衛出版，1997年，陸鏗序）

史學大師唐德剛，也為江南犧牲後半生，寫了經國前半生，有無限的感慨。唐德剛說「歷史中有必然的軌跡可循，但在必然的軌道上，常常會發生偶然的事件所遏阻、延緩、或加速，而發生迂迴、停滯、逆轉或躍進等不同的現象」；他以為：「經國最後四年雖短，卻是歷史功能可圈可點的另一半」，江南如再活四年，他對蔣的總評，應該會有好話要說。

一個獨特性格的政治人物，不論愛憎他的人如何對立，總是話題，因為性格的豐富，總有吸引人的魅力。

時報出版的蔣傳，雖未能引起政壇議論，但對政治人物的公允評價，亦誠屬可貴；也許書中的人物有些人還活跳跳地在過活，所以作者在尾聲也以人物摘記的方式，將書中人物的現狀作了交待，這個部份，很有趣。✍